



## 春风桃李有余哀 ——深切怀念本师肖东发先生

■杨虎

转眼间,本师肖东发先生辞世已经一年。在离开他的日子里,我经常怀着悲伤和思念之情对空发问:“这么好的一位老师,怎么说走就走了呢?”他走得早,才67岁,刚刚退休不久,正是要安享天年的大好时光;他走得突然,让人手足无措,至今都无法缓过神来。他的离去,让相当多的人成了学术、工作和生活中的孤儿。对于依旧在校园学习、工作的学生而言,没有了最亲近、最敬爱的老师,这校园就像是一座缺少了温度的城堡。

2016年4月21日,在本师的骨灰告别仪式结束后,我在微信上转发当日的新闻稿,并感慨道:“今天最让人宽慰、感佩的是,先师既非领导,也非常富豪,一介书生,北大教授而已,却有五六百人自发前来吊唁、告别,无数人留下了不同的泪水。他的离去,让相当多的人成了学术、工作和生活中的孤儿。对于依旧在校园学习、工作的学生而言,没有了最亲近、最敬爱的老师,这校园就像是一座缺少了温度的城堡。”

我于1998年入北大信息管理系读书,1999年春季学期,初聆本师讲授“中国图书出版史”课程。后来有幸拜在他的门下,从夫子游,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。敬享他“煦煦春阳的师教”,尔来十有八年矣。追思既久,感情自深。在我心中,他是一位真诚、朴素、博学多才的老派知识分子,也可以说,就是一位纯粹而典型的老书生。在他身上,仍能看到众多北大先贤身上那些可贵、可敬的流风余韵。

本师做学问真诚,视学问为生命,做起学问来,情不自禁,欲罢不能,真有拼命三郎的劲头。他在师门沙龙或聚会时,开篇就会说:“师门的学术风气应该搞得浓浓的,我们要把读书放在很重要的地位,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,这才是师门的立身之本。”他还教导我们要坐冷板凳,提倡做“书呆子”。以讲课而论,他常说的一句话是“课不仅要常讲常新,还要常讲常好”,因此就必须精益求精,不能偷懒。2009年,由他主讲的全校通选课“中国图书出版史”被评为北京精品课程。教师节前,学校召开表彰大会,通知他作为代表上台领奖。但肖东发正好出差在外,便在电话中嘱我代他完成这项光荣的工作。后来,我把荣誉证书和获奖名录呈送给他的时候,他分外高兴,动情地说:“在北大当老师,一定要努力做出像样的成绩来,最好的体现,就是在

每年的荣誉册上,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和成果。”依我多年的体会,本师绝对是一位不慕名利的淡泊之人,但在学术事业上,却不甘平庸,不断做着力争上游、多出精品的事。这番话,既是肖东发宗旨的最佳体现,也是对我的殷切教导。

我追随本师多年,一个突出的感觉是,他总是很忙,忙上课、忙写作、忙开学术会议、忙做课题研究,忙指导学生论文,忙和学生谈话……很难见他优哉游哉地享受过片刻闲暇。我每次见他,寒暄数语以后,就直奔学术主题。白天时间不够,便焚膏继晷,熬夜很晚才休息。同门同学收到他半夜一两点甚至是三四点发来的邮件,是常见之事。我常劝他:“您身体本来就不好,年纪大了,老熬夜,身体肯定受不了。”他笑着回答说:“习惯了,积习难改啊。身体虽然不好,但我相信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!”为了让肖东发注意养生之道,我特地买来《国学大师的养生智慧》一书送他。但这些都无用处,他仍是夜以继日地扑在挚爱的学术研究和育人工作上,最终用心血浇灌出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桃李园,写就了一本又一本、一篇又一篇于世道人心、学术脉有益的著作与文章。他的生命状态,像极了丁文江先生书桌上方摆放的那句话:“明天就死又何妨,只拼命做工,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!”

本师待人真诚,满面春风,一团和气,是接触过他的人的共同印象。作为学生,他严守尊师之礼。在授课时,一旦提及他的老师王重民、刘国钧、郑如斯等先生,一定是充满着深情和敬意。负责北大以来,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,是1999年春季学期,他在昌平园为我们全班28人讲述王重民先生与敦煌学以及母系渊源时的情景。其时,他口讲指画,言之谆谆,动情之处,几欲落泪。听讲者则唏嘘感慨,无不动容,受教良多。2003年,适逢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,他在《王重民与向达先生祭》一文中,深情回忆了王先生对读史治学的教导和影响。他写道:“王先生对我的直接教诲和间接影响如涓涓细流,一直在我心中流淌。我每年给学生讲《中国图书出版史》及近来讲《文献检索与利用》课时,都要讲到王先生的学术成就,都要用到王先生所编的工具书及其著述。王重民先生不仅永远活在我的心里,我还要让年轻的学生们记住他。”爱师敬师之情,溢于言表。他曾教导我,做人要厚道,尤其要尊敬师长,并引自己的经历予以佐证。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,考取图书馆系的研究生,系里诸师接受他的原因,除了勤奋好学、有潜力以外,更重要的是



肖东发教授

为人仁义,不整人,深明师道尊严。他不仅对自己的老师如此,对其他师长也是如此。他常说,北大最珍贵、最应该受到尊重和礼遇的就是各位学术大师。有一年,他请许渊冲先生为师门做演讲,由我的朋友开车带他亲自到府上恭迎许先生。讲座结束后,因朋友未及赶到教学楼去接许先生,他便打电话催我。在急切、严肃的语气中,透露着对许先生的敬重之意。

作为老师,本师春风化雨,关爱学生,暖如阳春。他常对大家说:“我想让你们觉得做我的学生是最幸福的,要让别人都羡慕你们成为我的学生。”他的一门心思就是倾其所有、尽其所能把每位学生都培养好。他对所有的学生都很尊重,不问家庭出身,不看所学专业,开门办学,一视同仁,和蔼可亲,很少有疾言厉色、拒人千里之外的时候,因此,学院的学学生都亲切地称他为“肖爷爷”。他在教学中特别重视社会实践,要求学生在“行万里路”。在每门课上,他几乎都会安排参观考察的环节,教学经费有限,他就自己出钱租车、买门票,并自任解说,带大家参观故宫、老北大、国子监、台湖书城等地方。他还通过朋友关系设立了多处实践基地,让学生免费实习。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毕业时,他虽非班主任,也并非同学家长,说几句勉强的贴心话,给每届学生都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。学生中有家境贫寒或困难者,只要他得知,就会送钱送物,周济一时之困。我上大四时,二姐患重病,我去外地探望之前,他知道了此事,托人带着500元以作盘缠。进入师门后,他更是对我视如己出,关爱有加,经常留我在家用餐,送钱、送衣、送书,有几次我在医院打点滴,他知道后,非要和师母一起来看望,让我坐立不安。我的父母、岳父母来京,他必要热情招待,待为上

宾,让我们全家人十分过意不去。他多方提携后进,不遗余力,除了悉心指导我读书学习外,还多次带领或推荐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,结识学界名流,饱览山河之美,让我大开眼界。我参加工作以后,有一段时间,因为工作职务之事,抽空就向他倾诉、抱怨,他每每默然不语。我以为,他一贯不赞成我做行政工作,所以对此事并不关心。谁知,后来好几位领导见我时,都说,本师好多次在你们面前举荐我,说到我职业发展的大事。我真是既感且愧,他平生最不喜因事求人,却可屈尊处处为我逢人说项,而且从来没在我面前提及一句他为了我做了什么。在处理他的后事时,师门的很多人都恭恭敬敬地,忙前忙后。事后,很多师长在我面前说,真羡慕本师有这么好弟子!我则答以:这都是本师生前的教化、关爱之泽所致。他对每个学生都是情同父子,恩重如山。我们结草衔环,理所应当。

本师还真诚地爱着北大。他对北大的历史传统、风物变迁、人物掌故、精神气度,保持着浓厚的兴趣,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。他给我讲,他在北大听的第一堂课,是侯仁之先生讲的“北京与北大”,印象极好且深刻。这门课实在太重要了。我们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,就得先从爱家乡、爱母校做起。作为北大学生,首先就得爱北大!他带着我们编撰“北大人文物丛书”和“北大文化丛书”,想为北大120周年校庆献上大礼。直到去逝前,还念兹在兹,不能忘怀。他连续多年为北大新生讲授入学第一课“北大风物与人文精神”。晚年还带着我并邀请陈光中先生,开了全校通选课“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”,培养学生爱北大、爱北京、爱国家的情怀。平日但凡有来访者,无论公务接待,还是私人朋友,他都会主动带着大家去逛校园,热情、风趣地讲授燕园的

前世今生、北大的精神风骨,惹得其他行人紧随其后,不忍离去,成为未名湖畔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线。他还给我说过,人生一世,能在名片上印上“北京大学教授”这几个字,足矣!因为肖东发对北大的熟悉和挚爱,有人尊称他为“爱校主义者”,肖对这个雅号,欣然受之。

本师在生活中最大特点,则是非常朴素,朴素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。他没有任何名牌的东西。夏天去家里看他,穿的跨栏背心,破着好几个洞,竟有猫须之象。在买车之前,不分春夏秋冬、刮风下雨,一直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,穿梭于校园内外。有一年冬天,下课后,天降大雪,他推着自行车,和我穿行校园,很兴奋地说:“我从小生活在东北,不怕冷,见到雪就开心,能让人更加精神。”可是我看他光着双手骑车,一定很冷,就把新买的手套送他,聊以御寒。他一再推辞,后来在我的坚持下带上手套出校门,骑上车,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。当晚,他给我回邮件,特别写道“感谢你那双温暖的大手领导见我时,都说,本师好多次在你们面前举荐我,说到我职业发展的大事。我真是既感且愧,他平生最不喜因事求人,却可屈尊处处为我逢人说项,而且从来没在我面前提及一句他为了我做了什么。在处理他的后事时,师门的很多人都恭恭敬敬地,忙前忙后。事后,很多师长在我面前说,真羡慕本师有这么好弟子!我则答以:这都是本师生前的教化、关爱之泽所致。他对每个学生都是情同父子,恩重如山。我们结草衔环,理所应当。”

本师还真诚地爱着北大。他对北大的历史传统、风物变迁、人物掌故、精神气度,保持着浓厚的兴趣,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。他给我讲,他在北大听的第一堂课,是侯仁之先生讲的“北京与北大”,印象极好且深刻。这门课实在太重要了。我们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,就得先从爱家乡、爱母校做起。作为北大学生,首先就得爱北大!他带着我们编撰“北大人文物丛书”和“北大文化丛书”,想为北大120周年校庆献上大礼。直到去逝前,还念兹在兹,不能忘怀。他连续多年为北大新生讲授入学第一课“北大风物与人文精神”。晚年还带着我并邀请陈光中先生,开了全校通选课“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”,培养学生爱北大、爱北京、爱国家的情怀。平日但凡有来访者,无论公务接待,还是私人朋友,他都会主动带着大家去逛校园,热情、风趣地讲授燕园的

前世今生、北大的精神风骨,惹得其他行人紧随其后,不忍离去,成为未名湖畔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线。他还给我说过,人生一世,能在名片上印上“北京大学教授”这几个字,足矣!因为肖东发对北大的熟悉和挚爱,有人尊称他为“爱校主义者”,肖对这个雅号,欣然受之。

本师在生活中最大特点,则是非常朴素,朴素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。他没有任何名牌的东西。夏天去家里看他,穿的跨栏背心,破着好几个洞,竟有猫须之象。在买车之前,不分春夏秋冬、刮风下雨,一直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,穿梭于校园内外。有一年冬天,下课后,天降大雪,他推着自行车,和我穿行校园,很兴奋地说:“我从小生活在东北,不怕冷,见到雪就开心,能让人更加精神。”可是我看他光着双手骑车,一定很冷,就把新买的手套送他,聊以御寒。他一再推辞,后来在我的坚持下带上手套出校门,骑上车,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。当晚,他给我回邮件,特别写道“感谢你那双温暖的大手领导见我时,都说,本师好多次在你们面前举荐我,说到我职业发展的大事。我真是既感且愧,他平生最不喜因事求人,却可屈尊处处为我逢人说项,而且从来没在我面前提及一句他为了我做了什么。在处理他的后事时,师门的很多人都恭恭敬敬地,忙前忙后。事后,很多师长在我面前说,真羡慕本师有这么好弟子!我则答以:这都是本师生前的教化、关爱之泽所致。他对每个学生都是情同父子,恩重如山。我们结草衔环,理所应当。”

画。但我有一次在家中获观他的旧作,十分惊服。其中有一幅周总理的肖像,画得惟妙惟肖,如同照片一样。本师特别解释说,这是总理去世后,他带着感情,认认真真画下来的,画成以后便珍藏至今。本师还喜诗歌,既能朗诵,也能自作新体诗。他讲授“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”时,能声情并茂地给学生大段背诵闻捷的诗歌《我爱北京》;讲授“中国图书出版史”,谈到唐代皇帝的佞佛,则从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讲起;讲敦煌遗书的内容时,特别爱讲王梵志的诗。有一年中秋节,晚上下课后,肖东发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去未名湖畔赏月,在皓月当空、人声鼎沸之际,他带着大家齐声朗诵张九龄的《望月怀远》。他还写了大量的新体诗,我们都真心觉得好。

以上种种,如果总结为一句话,我想就是“外未名而内博雅”:不注重、不追求外在的修饰、地位和名气,而在学问、品行、精神方面却如博雅塔一般伟岸、峥嵘和刚毅。这是一种“轰轰烈烈的静”,外表看似安静、朴素、平和,但胸中却有大海般的永远奔涌着思想巨浪的轰轰烈烈。这正是代又一代优秀北大的精神气度。

要特别说明的是,我亲炙于本师十数年,由于资质愚钝,所学不过九牛一毛,至今仍是“珠玉在前,觉我形秽”。肖东发的道德、风度和学问在我面前,就如泰山北斗一般,永远无法企及。有人说,我可以继承他的遗著,实在是抬举和高看我,绝非实事求是的说法。我在中国出版史、北京风物两个领域虽有兴趣,也多承他栽培,因而略有心得。但直到现在,仍是一个站在门外听讲的小学生。所能做的,就是在工作之余,继续精读他的遗著,完成好他生前布置的作业,再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,尽量让这些宝贵但不时髦的学问不要在北大中断了。在气质转化方面,则努力向着“外未名而内博雅”的方向不断前进。也好让肖东发的在天之灵,不致有落日孤城、后继乏人的悲凉之感。

2016年4月16日,我在得知他去世后,含泪写下挽联:

不慕权贵,不修边幅,不追名利,不辍耕耘,书生至死犹存旧风范;

真爱北大,真醇典籍,真教弟子,真做学问,仁者永生堪励新青年。

横批:是我本师。这四个字包含的感情很复杂。我以能有这么好的本师而无比自豪和欣慰,又以过早地失去这么好的本师而无限悲伤和痛苦。唉,心事未了身先去,春风桃李有余哀,永远怀念我的好本师肖东发先生!

## 范仲淹“忧乐”思想源流及价值

■洪朝宗

范仲淹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。本文标题中的格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出自范仲淹的散文名作《岳阳楼记》。这篇散文文辞优美,排比工整,叙事、写景与议论互相融合,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,也能使人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。作者通过描绘岳阳楼的景色及迁客骚人登楼览胜后产生的不同感情,表达了自己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旷达胸怀与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崇高思想和远大政治抱负。它既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精华,也成为宋明理学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先声。对推动我国古代廉政建设有其进步作用。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我国学术界就出现过忧乐问题的讨论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格言深深扎根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。至于此格言源于哪一家学派,其看法不尽相同。

在以往的研究中,曾有学者认为格言源于儒家,其主要依据是孟子的一段著名论述:

“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。他们认为范仲淹是把“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”思想进一步发展成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
笔者以为孟子主张“乐民之乐”“忧民之忧”即“忧以天下,乐以天下”,集中表达了儒家的“仁爱”思想。范仲淹的格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则是表达一种廉政思想。二者虽然均涉及“忧”和“乐”,文字上相似相近,但内容各异。从思想内容上看,我以为范氏格言主要是受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,其中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明显源于道家的廉政思想。

《老子》第六十六章中说:“是以圣人欲上民,必以言下之;

欲先民,必以身后之。”就是说,圣人要想统治人民,必须用言辞下对人民表示谦下;想要领导人民,必须把自己置于人民之后。在《老子》第六十七章中又说:“我有三宝持而保之:一曰慈,二曰俭,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慈,故能勇;俭,故能广;不敢为天下先,故能成器长。”所谓“不敢为天下先,故能成器长”,是指在个人利益上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,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。这实际上是“欲先民,必以身后之”思想的进一步延伸,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。接着该章中又进一步强调:“今舍慈且勇,舍俭且广,舍后且先,死矣!”就是说舍弃慈爱求勇敢,舍弃节俭求奢侈,舍弃退后而求争先,这是死路一条!这样老子进一步阐述了“欲先民,必以身后之”的重要性,强调舍此无其它出路。范仲淹提出的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正是强调在享乐上“不敢为天下先”,“必以身后之”。这与

道家的思想如出一辙,据此,不难推断《老子》中的“欲先民,必以身后之”,“不敢为天下先”就是范仲淹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思想源头。不过范仲淹对“不敢为天下先”,“必以身后之”是有选择的,只局限在享乐方面。而在忧国忧民方面,他旗帜鲜明,力主要敢为天下先,明确提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主张。这是范仲淹对老子廉政思想的完满继承。范氏格言文字对仗,旗帜鲜明,思想先进,与老子廉政思想比,诚可谓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。

范氏格言蕴含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的思想精华,也凝聚了几位圣贤人物的政治智慧与道德情操,是我国思想史、文学史上的一支奇葩。

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,曾主持庆历新政,主张刷新政治,为守旧派所阻。后出任河东、陕西宣抚使,历任邠州、邓州、杭州、青州知州。他一生忧国忧民,为

官廉洁奉公,生活极其俭朴,深受民众爱戴。据宋史记载:“仲淹内刚外和,性至孝。以母在时方贫,其后虽贵,非宾客不重肉。妻子衣食,仅能自充。而好施予,置义庄里中,以赡族人。”“死之日,四方闻者,皆为叹息。为政尚忠厚,所至有恩。邠、庆二州之民与属羌,皆画像立生祠事之。乃其卒也,羌数千人,哭之如父,斋三日而去。”(《宋史》卷314《范仲淹传》)范公为官为政思想比,诚可谓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。

1939年7月,刘少奇同志在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”的演讲中曾引用此文中的格言,把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精神看作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一种素质和修养。1943年刘少奇此演讲被收入中共《整风文献》。

《岳阳楼记》写于宋仁宗庆历年间,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。限于写作年代,此文难免会有历史局限性,范氏文中提出的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”诚为可贵,但接下来他又提出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,带有明显的忠君思想,打上了很深的君主制的烙印。当然,我们不宜过多苛求于古人,总体来说,此文仍不失为一篇优秀散文。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忧乐观”,为古今“忧乐”的讨论指明了方向,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,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,我们需要努力继承和发扬。白云千载,世事沧桑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征途中,时代呼唤精神,社会需要道德,没有高尚的精神,无法完成民族复兴之重任。回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脉,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精神依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、传承和发扬的一种崇高思想境界。